入文坛后创作的魔幻与现实交相辉映的《幽灵之家》《爱情与阴影》和《夏娃·鲁娜》等被认为是“爆炸”后拉美文学继续辉煌的标志。  
　　1942年，伊莎贝尔·阿连德在秘鲁首都利马出生，父亲托马斯·阿连德时任智利驻秘鲁外交官，是后来智利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堂弟。1945年，她的父母离婚，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智利圣地亚哥外祖父的家中生活。1953年，伊莎贝尔的母亲与职业外交官拉蒙·乌依多布洛结婚，她随父母先后去往玻利维亚和黎巴嫩。1958年回国后，她认识了未来的丈夫、理工科大学生米盖尔·弗利亚斯。  
　　1973年9月11日星期二，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社会党人萨尔瓦多·阿连德领导的民选政府，开始了长达17年的军事独裁统治。这次政变彻底改变了伊莎贝尔的生活：许多亲人被监禁，她自己也不得不流亡国外。在与丈夫和两个孩子到达委内瑞拉时，伊莎贝尔随身带着一把家里花园的泥土，她说：“我生命的第一阶段结束于1973年的那个9月11日。”从此，她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最终成为在世界文坛享有盛名的女作家。  
　　1990年，民选总统帕特里西奥·埃尔文执政。在阔别15年后，伊莎贝尔回到智利，从埃尔文手中接过加布列拉·米斯特拉尔文学奖。在随后的日子里，她分别获得智利国家文学奖、丹麦安徒生文学奖和智利圣地亚哥大学名誉博士称号等奖项。  
　　在出版商眼中，她是“穿裙子的马尔克斯”  
　　回顾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创作生涯，《幽灵之家》是令其蜚声文坛的经典之作。1981年，99岁的外祖父决定绝食自杀，伊莎贝尔写给他一封长长的信，就是这部《幽灵之家》。这是一部气势恢弘又饱含深情的全景式小说，作者在流亡外国期间，以自己外祖父母家庭为原型，用犀利而不失幽默的笔触，讲述了两个家族近一个世纪的兴衰史，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拉丁美洲的变幻风云。1982年，该小说出版；同年，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拉美文学“爆炸”为世界瞩目，魔幻现实主义成为最耀眼的文学创作风格。作为拉美作家中少有的女性，伊莎贝尔声名鹊起，被一些出版商称为“穿裙子的马尔克斯”。  
　　最新由译林出版社再版的《爱情与阴影》，则是伊莎贝尔·阿连德的第二部小说，于1986年10月在西班牙出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许多国家读者最喜爱的书籍之一。作为《爱情与阴影》的译者，我认为它不仅是这位智利女作家创作生涯中的新里程碑，还是西班牙语文学史上又一部具有影响力的作品。  
　　《爱情与阴影》以女新闻记者伊雷内和弗朗西斯科的爱情为主线，讲述了身处不同境遇、遭受不同经历的三个家庭的故事：弗朗西斯科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原籍西班牙，1936年西班牙内战后，几经周折由西班牙流亡到智利定居。伊雷内与弗朗西斯科相识后，因志趣相合产生感情。埃万赫利娜是农夫迪格娜的女儿，她的身体一直不好，到了十五六岁，癫痫病频频发作。每当她发病时，便会出现房屋震动，家畜、家禽飞舞，家具跳动等“奇迹”。当地人认为这是圣母创造的奇迹，便把埃万赫利娜当成圣女，纷纷前来求她保佑。伊雷内和弗朗西斯科闻讯后去采访，恰好碰上一伙军人在中尉拉米雷斯的带领下抓捕埃万赫利娜，说她妖言惑众。谁知埃万赫利娜癫痫病发作，显了“神通”：中尉和他的士兵被“神力”打翻在地，洋相百出。中尉恼羞成怒，派人逮捕了她并施以毒刑。从此，埃万赫利娜便失踪了。  
　　出于正义感和同情心，伊雷内和弗朗西斯科四处奔走，寻找埃万赫利娜。在一处废弃的矿内，他们终于发现了她和几十具无名尸体。二人拍照后决定公布于众，揭露暴行。当局为掩盖丑闻，逮捕了拉米雷斯，随后暗中将他释放。伊雷内则遭到暗算，身受重伤，在弗朗西斯科的精心照料下起死回生。他们知道再也无法在国内生活下去，最终恋恋不舍地离开祖国。  
　　《爱情与阴影》笔触犀利幽默，作者将普通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在军事独裁统治下对正义自由的渴望，细腻生动地再现出来，深深触动读者内心。同时，小说主题思想严肃，展开的社会场景广阔而深刻，但在叙述中却充满了生活的情趣，富有人情味。  
　　用书写保存对家人和祖国的记忆  
　　进入21世纪后，伊莎贝尔·阿连德不断有佳作面世。小说《老照片》再现了《财富的女儿》和《幽灵之家》中的人物，与之组成叙事三部曲。女作家的另一三部曲是“山鹰和美洲豹的记忆”：其中既有描述亚马孙森林现实与魔幻并存的印第安原始部落神奇故事的《野兽的城市》，也有展现充满东方色彩的喜马拉雅神秘王国的《金龙的世界》，以及讲述发生在非洲肯尼亚密林深处五光十色的传奇故事《矮人们的森林》。通过这三部小说，作者表达了希望不同种族拥有美好和谐社会的良好愿望。  
　　在近10年中，伊莎贝尔笔耕不辍，陆续发表的小说有讲述西班牙征服者如何建立智利圣地亚哥的《伊内斯·德尔·阿尔玛·米娅》，叙述18世纪一个非洲女人在法属加勒比岛屿传奇故事的《海底的岛屿》，发生在旧金山的扑朔迷离的绑架案《里贝尔的角色游戏》，以及具有强烈现实主义色彩的《远离冬天的故事》等。在这部2017年出版的小说中，作者通过一位智利女孩、一个危地马拉的非法移民和一个美国人在纽约经历大雪的遭遇，讲述了当下境遇中美洲人的爱情和机遇。  
　　值得一提的是，伊莎贝尔在具有心灵震撼力的两部散文集《阿弗洛狄忒》和《我的虚构的祖国》中，不断寻找着对亲人和国家的记忆。《阿弗洛狄忒》是伊莎贝尔在遭受丧女之痛、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后完成的。在近1年时间里，她日夜看护着女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终日与痛苦为伴。直到她做了一个奇特的、有关食物的梦，令她明白痛苦已经结束，丰富美好的食物是缓解人生苦痛的一剂良药，并得以让地球上的物种生存与繁衍。  
　　《我的虚构的祖国》则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散文集，彼时已经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伊莎贝尔以满腔思念之情回忆着自己最亲近、却已相距遥远的祖国——智利。在写作《幽灵之家》时，她曾说过：“写这部书是为了重新接近我失去的祖国，跟我四散的家人重新团聚，让死去的亲人形象复活，保存对他们的记忆。”而《我的虚构的祖国》，可谓是写在这条思念的延长线上。  
　　人像速写、制图：蔡华伟  
　　印第安哲学中有“美好生活”的重要理念，即“Sumak Kawsay”“Suma Qama？a”或“Teko Kavi”。这一思想源于安第斯国家共同体，在上述印第安克丘亚语、艾马拉语和瓜拉尼语中，有着相近的哲学内涵。  
　　探究印第安人哲学，“美好生活”不仅是生活信条，更是一种政治理念，一种哲学思想，一种安第斯山脉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构建。它在历史上已经获得多个南美印第安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安第斯国家共同体的根基，同时在现代国家框架下得到广泛认同，写入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宪法。一位印第安神父曾说：“我们不是问题，我们是解决办法。”  
　　“美好生活”在具有地区性意义的同时，更兼具改变不合理发展理念的使命。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发展是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关注现实的人”，而“发展的目标”则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  
　　谈及发展，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欧美，却发现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在经济上陷入泥淖，政治体制及其一贯倡导的西方价值观更备受质疑，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需要走向多元，西方理念已不再是唯一选择。而西方主流价值观念中讲求要生活得更好、享受得更好的观念，更令社会注重财富积累速度、民众追求个人资产数目，人们仅仅将幸福观念等同于物质上的满足感，忽略了精神追求。这种短视且片面的发展观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问题丛生。  
　　关于拉美地区的发展问题，在《拉丁美洲通史》中有着这样的描述：“本地区发展问题的症结在于疏通发展渠道”。回顾历史，由于克里奥尔人（出生在拉美殖民地国家的白人）与欧洲人具有同源性，在思想上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渴望融入西方世界，纷纷前往欧美发达国家留学，在政治经济领域广泛接纳西方理论与体制；另一方面，又希望获得作为拉美人的独立性，积极参与拉美独立战争，并投身国家独立后的发展建设求索之中。例如19世纪阿根廷总统萨米恩托在其代表作《法昆多——文明与野蛮》一书中批判的阿根廷独裁者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就是其中之一。这部分克里奥尔人，在赶走西班牙殖民者后取而代之，构建起所谓的独立国家，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专制统治的政治结构。  
　　不同于克里奥尔人，以印第安原住民组成的印第安社会思想有着诸多近似性，整体性较高。虽然原住民在各族群间存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却分享着共同的历史记忆、社会制度和发展观念。这使他们在思考拉美地区如何发展时，能够提供一条区别于欧美的理念与路径。  
　　对于印第安原住民来说，生活的评判标准不仅在于关注经济发展，更需要从自身价值观出发，注重人类个体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均衡发展，这是对当今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以及可持续发展道路问题的积极回应与探索，也是“美好生活”哲学思维的重要内涵。  
　　安第斯山脉孕育出的“美好生活”理念，不仅从理论角度对西方发展道路提出质疑，在现实中也取得促进拉美社会不断进步的成效。近几十年来，拉美地区印第安政治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印第安原住民逐步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并逐渐拥有一定政治话语权，在法律上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权利。  
　　拉美地区的发展与进步，使被埋没了几个世纪的印第安文化，逐渐引起世人关注。早在2000年，联合国环境署便将印第安文化中的“帕恰妈妈”写入青少年环境教科书，鼓励全世界的孩子学习印加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热爱大地的理念。  
　　爱丁堡是英国北方重要城市，也是苏格兰首府，1437至1707年曾为苏格兰王国的都城。游览爱丁堡，我首次知道了铅黛色。当地朋友介绍，爱丁堡位于苏格兰东海岸入口，坐落在绵延的火山灰和岩石峭壁上。这里的建筑大多就地取材，用坚固的火山岩建成，经过多年风雨侵蚀，呈现出独特的铅黛色。  
　　去往爱丁堡途中，我脑海中浮现出优雅的格子裙、悠扬的风琴声和绵延起伏的草地，一切是那么柔美清新。然而走进爱丁堡，感受到的则是充满历史沧桑般的厚重：高大庄严的欧式建筑、宏伟恢弘的荷里路德宫、凝重如诗的爱丁堡城堡，以及星罗棋布的博物馆和美术馆。  
　　从苏格兰王宫荷里路德宫起步，行走在老城的躯干——皇家一英里大街上，我们被铅黛色的建筑环绕。大街尽头是著名的爱丁堡城堡——地形陡峭险峻，外观黝黑深沉，它屹立了1400多年，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历史，成为爱丁堡乃至苏格兰的象征。站在城堡最高处俯瞰，密密麻麻的铅黛色建筑伸展开去，直至海边，沉静的色调构成了古城的典雅背景。  
　　爱丁堡人尊重历史，轻易不拆除老房子，轻易不改变城市主色调。荷里路德宫附近的苏格兰议会大厦是座现代建筑，因与老城建筑风格不同而引发争议。这之后，政府更加注重保护城市色彩。但为体现现代特色，爱丁堡的交通指示牌和公交车等交通工具却又用色大胆，颜色鲜艳，使城市呈现出古老与现代交相辉映的魅力。  
　　铅黛色建筑既有历史的沧桑、沉静的厚重，也有灵动的浪漫、激情的燃烧。在电影《一天》中，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的男女主角在这座遍布古老建筑的城市里萌发爱情。毕业前夕，两人各奔前程。临行之际，他们约定成为好朋友，并在之后每年7月15日见面。此后每年的这一天，他们如约相见。  
　　生活是现实的。多年后，蓦然回首，他们发现一直寻寻觅觅，其实最好的人早已在身边。这样的情调、这样美丽的约定，与爱丁堡的浪漫这样吻合。正想着，朋友指向一座暗红色的建筑说，这是英国作家罗琳写作《哈利·波特》的大象咖啡馆，她在爱丁堡居住期间喜欢在皇家一英里大街漫步，被这座城市浪漫古老的气氛所感染，进而迸发灵感，写下这部风靡全球的魔幻小说。  
　　铅黛色使爱丁堡弥漫着雅致，赢得“北方雅典”的美誉。每年爱丁堡国际文化节时，多元文化在此汇聚交融。我想，这样的文化古城应有文学大师。走进王子街公园，一座尖塔高耸峭拔，塔身黝黑，即使在铅黛色建筑群中也非常抢眼。古塔纪念的是一位文学家，他生于爱丁堡，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大学毕业后当过副郡长。他以苏格兰为背景的诗歌十分有名，但诗人拜伦出现后，他意识到无法超越而转写作历史小说，最后成为英语历史文学的鼻祖。他就是沃尔特·司各特。凝望坐在塔中心的司各特，他手持书卷，凝神所思，仿佛在默念自己的诗歌，抑或在构思鸿篇巨制。家乡厚重的历史和不屈的民族精神，铸就了他浓浓的英雄情结，成就了他的历史文学创作。司各特曾经说，如果不是为身体所限，他也许会成为一名苏格兰勇士。  
　　黄昏时分，夕阳下的爱丁堡披上一层金色外衣，金黄色打在铅黛色上熠熠发光。我突然感到，真正的爱丁堡就在铅黛色的建筑和古迹中。读懂铅黛色，也就读懂爱丁堡的过去和未来。  
　　“感情，要用心感受其中的感情！”谈起歌剧《泰伊思》，年近八十、鬓发花白的普拉西多·多明戈依旧热情满满，对在场每个人充满激情地强调着剧中充满尖锐冲突的感情，乃是法国作曲家马斯奈创作的歌剧《泰伊思》最打动他的地方。由此，“感情”二字，也深深刻印在我心中。这部歌剧，确是一场关于爱的生命咏叹，也是一次灵魂在信仰与欲望、宗教与人性间徘徊纠葛的艰辛旅程。  
　　歌剧《泰伊思》脱胎自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纳托尔·法朗士于1890年创作的同名小说。1921年，这部小说在中国有了读者。1927年，鲁迅在写给江绍原的两封信中说，《泰伊思》“实是一部好书”，既有原著小说珠玉在前，后有剧作家路易·加莱妙笔改编、作曲家儒勒·马斯奈精心谱曲，歌剧《泰伊思》最终于1894年2月16日在巴黎歌剧院首演。  
　　作为19世纪后半叶法国浪漫抒情歌剧的代表作，《泰伊思》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在沙漠深处静修的隐修士阿塔纳埃尔认为，亚历山大城美丽的交际花泰伊思罪孽深重，自己有责任拯救她的灵魂。在他的劝说下，泰伊思决定弃绝往日生活，跟随他历经重重磨难穿过沙漠，进入女子修道院，成为虔敬的修女。然而，阿塔纳埃尔却陷入对泰伊思的疯狂爱恋，听到她病重的消息后奔往修道院，在濒死却圣洁的泰伊思面前，这位曾经坚定的修士从精神巅峰跌落凡尘，最终走向崩溃。  
　　剧终时分，舞台中央巨大的荆棘王冠落向躺倒在地的爱神维纳斯雕像，泰伊思也最终穿越荆棘，告别凡俗，升向天堂。我想起多明戈对这部歌剧难以割舍的热情，也想起他谈及阿塔纳埃尔斑驳的心路历程时，说出那句“我成功拯救了泰伊思的灵魂，但我失去了自己的灵魂”时深深动容的神情。感情，饱含爱欲纠葛的感情，以及人性中宗教信仰无法泯灭的凡俗之爱，的确是读懂这部歌剧的钥匙。  
　　几百年来，基督教中灵与肉的二元对立始终是西方文学作品中不曾衰落的命题之一，小说《泰伊思》曾被视为反对基督教的一部杰作，故事中的宗教信仰和禁欲主义荒诞脆弱，在生命本能面前土崩瓦解。作者法朗士具有左翼倾向，积极投身政治，晚年还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曾声明：“我只有两个敌人：救世主和贞洁”。  
　　然而，无论有意无意，剧作家加莱和作曲家马斯奈在创作歌剧《泰伊思》时，似乎并未着力刻画宗教信仰的虚伪荒诞，而是对无法泯灭的爱情之惊心动魄浓墨重彩，从而在信仰与人性、皈依与越界之间形成巨大的感情张力，令这部情节相对简单的歌剧始终保持着紧张感，尖锐的矛盾冲突仿佛时刻会在下一秒呼之欲出。  
　　如此激烈的情感挣扎在作曲方面赋予马斯奈极大的发挥空间，庄重朴素的基督教合唱与色彩斑斓的东方歌舞处于整部歌剧音乐创作的两端，从一个侧面体现出19世纪欧洲作曲家对东方音乐兴趣浓厚。在《泰伊思》中，东方风格的音乐大多用于展现喧闹欢乐的场景，节奏热烈活泼，音色绚烂，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描绘基督教生活的音乐，和声纯净，节奏平缓。尤其是小提琴独奏《沉思曲》，温暖的音色和深情的旋律每每出现在救赎与升华的情节之中。  
　　事实上，宗教与爱欲音乐语汇的交融是法国浪漫主义歌剧的一个典型特征，曾出现在诸多歌剧里：在古诺创作的歌剧《浮士德》的教堂场景中，玛格丽特因越轨行为向上帝祈求宽恕，乐队配以令人心驰荡漾的音乐伴奏；在马斯奈的另一部歌剧《曼侬》中，女主角被修道院庄严的宗教氛围震慑，祈求上帝谕示她如何打动德·格里厄的心，配乐同样恰到好处地烘托了气氛；及至《泰伊思》，马斯奈在表现这位风情万种的女性遁入修道院结束一生时，在纵欲主义与基督教禁欲主义之间找到了音调上的最佳平衡：当《沉思曲》的小提琴柔声吟咏响起，泰伊思心怀感恩，在音乐高潮中幸福高歌，而阿塔纳埃尔则喃喃悲泣、惊慌呼唤，反差巨大令人感慨。  
　　为完美呈现这部歌剧名作，国家大剧院集聚“歌剧之王”多明戈、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埃尔莫奈拉·亚赫、男高音歌唱家李毅、法语歌剧指挥帕特里克·富尼耶和导演乌戈·德·安纳等众多艺术家。这是多明戈所饰演的第139个歌剧角色，从演唱方面，他这样阐述自己为何一直以来钟爱《泰伊思》：“我从男高音转型为男中音，在转型过程中，我在寻找更多优秀的作品，阿塔纳埃尔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中音角色，所以我选择这部歌剧进行演绎。”  
　　在导演兼舞美设计乌戈·德·安纳看来，《泰伊思》是一部音乐诗，他以超越真实、富于象征意味的设计元素构成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舞台空间，无论是巨大的荆棘王冠，抑或破碎的维纳斯雕像，其含义均耐人寻味。同时，所有舞美背景元素均可移动，通过它们的不断变换，展现出剧中人物的漫长旅途和抵达亚历山大港时的情景。而投影技术的应用，则完美地呈现出阿塔纳埃尔如梦似幻的眼中视野与内心世界。此外，演员表演是安纳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每次排练时，哪怕是群众演员动作的微小差别也会引起安纳的重视，他走上排练场，一点一点地纠正，甚至会亲自示范如何表现歌舞场景中的肢体语言。  
　　饰演泰伊思的亚赫说，这并非她与多明戈的第一次合作，然而这一次在国家大剧院的合作却令她非常难忘，剧组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体现出对于这部歌剧和古典音乐的热爱。的确，《泰伊思》是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五十九部歌剧，也是继《纳布科》《西蒙·博卡涅拉》和《麦克白》后，多明戈与大剧院合作呈现的第四部歌剧作品。为何一再重返中国？为何频频在大剧院登台？用多明戈的话来说：“中国在古典音乐市场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家大剧院十年来为古典音乐和歌剧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贡献良多，我被他们对古典音乐的热爱所感动”。  
　　走下短道速滑男子1500米赛场，韩天宇的心情还难以平静。虽然只能参加B组决赛，无缘奖牌争夺，距离他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有些遥远，但这就是冬奥会赛场，竞争残酷。  
　　2月10日，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正式开赛，江陵冰上运动中心被紧张而激烈的氛围包裹。虽然中国男队遗憾地无缘1500米A组决赛，最好成绩仅是韩天宇获得的第八名，但队员们在比赛中表现积极，展现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而女子3000米接力项目仅在资格赛阶段便两度刷新奥运会纪录。预赛第二组出场的中国女队实力爆发，滑出了4分05秒315的好成绩，比韩国女队刚刚创造的冬奥会纪录快了近1.3秒。  
　　竞争激烈超想象  
　　男子1500米半决赛的激烈场景，似乎只能通过慢镜头的回放才能看清：被分到了同一小组的3名中国选手，试图利用集体作战的优势抢位，原本已处于前两位的韩天宇和许宏志被韩国和匈牙利选手的突然发力打乱了节奏。武大靖摔出赛道，许宏志早早地退出了争夺，只剩下独力支撑的韩天宇，第四位冲过终点，却与A组决赛失之交臂。  
　　事实上，男子1500米项目从预赛开始就已充满了火药味儿。这是东道主韩国队的优势项目，此次出战的林孝俊、黄大恒和徐一拉都曾在近两个赛季获得过该项目冠军，实力强大。而来自匈牙利、荷兰、加拿大等国家的选手，也具备了争夺奖牌的能力。每一次上场，对中国队而言，都是严峻的考验。  
　　预赛中，中国队队员波折不断。韩天宇和许宏志两人都被同组选手撞倒，摔出了赛道，而后因对手犯规，才得以被判进半决赛。  
　　“毕竟是四年一届的奥运会，每个人都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不会谦让一分。”武大靖赛后说，场上的竞争太过激烈，以至于几乎每轮比赛，都会有选手摔出赛道。  
　　半决赛，三人被分到同一小组，也让中国队队员有些始料未及，而同组竞技的还有韩国强手林孝俊、黄大恒，以及匈牙利选手刘少昂。“最开始是希望能打团队战，3个人互相照顾，但是竞争太激烈，场上的变化太多，实际情况往往会超出我们的预想。”韩天宇说。  
　　放平心态是关键  
　　中国女队在500米和3000米接力两个项目上均如愿晋级，3000米接力更是在预赛阶段就令人惊喜地创造了新的冬奥会纪录，大大地提升了队伍的信心。  
　　平昌冬奥会赛前，中国女队曾因主力队员臧一泽和林悦的受伤退出，几乎陷入无人可用的境地。而从当晚的整体表现来看，主教练李琰在最后时刻确定的参赛名单，依然值得期待。  
　　由范可新、周洋、曲春雨、韩雨桐组成的接力阵容虽然没有与韩国女队进行面对面的较量，却也在欧洲强队意大利队和荷兰队夹击中成功突围，展现出了一流的竞技水平，并刷新了韩国队在上一组比赛创下的冬奥会纪录。除周洋外，其余三人都是一晚双战，在500米资格赛中发挥出色，顺利晋级下一轮。  
　　在领衔出战接力比赛的老将周洋看来，平稳的心态是队伍出色发挥的关键，“赛前队员们也没想着破纪录或者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只想着做好自己，能拼到哪儿算哪儿。”  
　　“做好自己”，是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李琰常挂在嘴边的话。平昌冬奥会，中国短道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竞争形势，因此，队员们的心理状态始终是李琰关心的重点。在上海封闭集训期间，她就时刻关注着队伍的心理建设，“只有专注做好自己，才能更加强大”。  
　　无论比赛情况如何，都要学会控制情绪，调节心态，这是每位选手在进阶过程中的必修课。对此，曾参加过索契冬奥会的韩天宇深有感受，“这只是第一天比赛，不能证明什么，我会好好调整心态，反思场上出现的问题，然后就会放下包袱，专注后面的比赛。”  
　　“整体来看，大家的状态都很好，滑得很积极，我们具备跟对手抗衡竞争的实力。”接下来的比赛还需一场一场全力去拼，对此，武大靖充满信心。  
　　提升竞技水平和推动大众参与是一体两面，二者彼此借力，更能凸显冰雪运动补短板的价值所在，也为可持续发展夯实后劲  
            
　　本届冬奥会将决出102枚金牌，其中雪上项目70枚。三分有其二，“得雪上者得天下”，此言不虚。  
　　雪上第一大项是越野滑雪，设12枚金牌。越野滑雪又是冬季两项、北欧两项等项目的重要支撑，算下来，和越野滑雪直接关联的运动接近雪上项目的一半。如同田径之于奥运会的地位，越野滑雪也是冬奥会不折不扣的基础大项。称雄越野滑雪，“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的豪情，也就有了更多底气。  
　　平昌阿尔卑西亚的林海雪原中，瑞典选手夏洛特·卡拉冲破挪威众将阻击，拿下越野滑雪女子双追逐金牌。前十名中，这对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邻居就占据5席。  
　　这样的基础大项上，中国选手仍在扮演艰苦的追赶者角色。参加这个项目的两名中国女将李鑫和池春雪，在一众强手的夹击中，身影仍显单薄。数次听到从事越野滑雪的教练员、运动员感慨其中不易，而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无法忽视基础大项的价值引领与现实短板。越野滑雪、高山滑雪、速度滑冰等项目需奋起直追，这是一道必答题。  
　　追赶的方式，也不再仅仅依靠全国数百人的专业队勉力支撑，孤军奋战。打破固有格局和模式，才能为冰雪基础大项的未来打开一片新天地。  
　　从竞技体育恶补短板的角度看，为现有队伍加添“新血”，跨界跨项选材是积极的尝试。打破冬夏运动的界限，从更为底层的运动规律中寻找项目共性，找准突破方向，世界范围内也不乏成功的案例。  
　　从大众体育涵养文化的角度看，北方人不再“猫冬”，南方人向往冰雪，其中既有经济发展对生活方式的影响和改变，也是运动文化融入社会生活的时代契机。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近两万名观众在零度上下的天气里露宿山野，只为第二天一早观看越野滑雪。冰雪运动扎根于大众，成为北欧文化的一种象征，也是顶尖选手源源而出的最可靠依傍。  
　　提升竞技水平和推动大众参与是一体两面，二者彼此借力，无疑更能凸显冰雪运动补短板的价值所在，也为可持续发展夯实后劲。从平昌望向2022年的北京，让追赶的身影不再单薄，“新血”与“新路”同样值得期待。  
　　2月10日，参赛选手在比赛中。  
　　当日，平昌冬奥会越野滑雪女子双追逐（7.5公里古典式+7.5公里自由式）比赛在阿尔卑西亚越野滑雪中心举行，瑞典选手夏洛特·卡拉夺得金牌。这也是本届冬奥会决出的首枚金牌。挪威名将玛丽特·比约根获得银牌，芬兰选手克丽丝塔·帕尔玛科斯基获得铜牌。有两名中国选手参加了比赛，李馨获得第五十一名，池春雪获得第五十五名。  
　　人民视觉